

“不忠的美人” ——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译论的颠覆

杨阳, 屠国元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5)

摘要: 女性主义由关注语言转向关注翻译, 形成并发展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两个方面对传统译论进行了颠覆: 一是颠覆了传统译论关于原文与译文是主仆关系的观点; 二是颠覆了传统译论关于译文要忠实原文的观点。这一理论否定单纯的语言翻译, 在承认个人兴趣的同时也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 女性主义; 翻译理论; 传统译论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6)01-0112-04

“fe minis m”一词, 19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于英文中, 上个世纪20年代初鉴于西方妇女运动被通称为“女权主义”, 80年代初, 国人将“fe minis m”翻译为“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fe minis m”术语没变, 人们针对该词的理解逐渐加深, “fe minis m”被解读为男女平等、女权运动、女性品质等。“女权主义”似乎已反映不出“fe minis m”的丰富内涵, “女性主义”却更能顺应和贴近女性的自然天性。女性主义正在渗入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翻译研究也不例外。随着近二十年翻译研究的迅速发展, 在翻译理论文化转向的大环境中, 女性主义翻译观终于走到了聚光灯下。

西方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为基础, 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 起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 minis m)。性别差异论认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是两性的社会差异而不是生理差异所致。女性主义在英国经历了两百多年的风雨, 第一次思潮发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第二次思潮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后。

西方女性主义并不是一个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 女性主义在不断的自我纠正中发展。女性主义有不少学派, “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 modernist fe minis m)思潮颠覆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观, 承认男女之间的差异性。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

化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英、法、美三国首先开始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破冰之旅, 各国的代表作分别是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自己的房间》、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的(Simon de Beauvoir)《第二性》和美国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神秘》。西方女性主义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为女性的独立宣言, 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也成为英国女性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看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西方各国发展的侧重点也有不同。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埃琳·肖沃特(Elaine Showalter)在《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文中总结: “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 它强调压迫;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精神分析学的, 它强调压抑;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文本分析式的, 它强调表达。然而, 它们都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批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女性主义打出了“女性必须得到语言解放, 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的口号^{[1](8)}。语言在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之中随父权、夫权地位的建立而成为一种“他/男人”的语言。男性长期处于社会经济、文化交融的中心, 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 久而久之便会产生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女性文化的排挤。英语中大部分以男性为中心的词汇可兼表女性, 女性的存在被人们所忽略。还有些词在指代男性时并没有污辱和贬低之意, 可

收稿日期: 2006-02-23

作者简介: 杨阳(1983-), 女, 湖南长沙人,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指代女性时却截然不同,如“Mistress”被特指为“情人或小秘”之意,而与之性别相对应的词“Mister”却尊称为“先生”。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随处可见,优秀女性常被冠以“女强人”的头衔,即便男性会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对女性的尊重和恭维,可这些“女强人”并没有在她们所参与的社会活动中享有任何礼遇和特权,她们与男性同工却不同酬。相反,如果女性采用与之对应的“男强人”一词做出回应,相信不只大多数女性会觉得这种称呼别扭,男性更会觉得这是一种小小的污辱。似乎造词者在最初设定“强人”一词时就只把男性圈在其内,如同中国古训“男儿当自强”一样,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人是社会中的强者,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本应充当弱势群体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女性精英份子涌现时,男性就只好在前面加上一个“女”字以突出“强人”的女性身份。

英国人类学家埃德温·安德尔(Edwin Anderer)的“统治语言(dominant)/弱势语言(muted)”^{[2](93-117)}中提及,统治语言是男性在公共场合所用的,而弱势语言是女性在私人场合所用。女性主义认为语言是自己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作为语言活动的一个具体方面,翻译活动必然成为女性争取权力的一个角力场。十六世纪,博学的女性不被允许进行创作而只能通过翻译宗教文本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语言在社会性别发展史中维系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女性主义把目光转向语言,投向翻译。

90年代以来,在英国学者苏珊·巴斯耐特(Susan Bassnett)和已故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费菲尔(André Lefevere)的推动下,翻译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翻译已经不再是语际间简单的转码活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倡导把翻译研究的领域拓展到民族、文化、经济,甚至政治的领域,其理论中也隐含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文化扩展,即西方强权文化对他们所谓的第三世界贱民文化的扩展。无独有偶,西方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观也移植到了西方女性主义对待东方女性主义的阐释上。西方女性主义眼里的东方女性主义不但裹足不前,而且东方女性的形象被凝固成为羸弱、无助、逆来顺受的典型。西方女性主义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学术视野,希望东方从属西方。不像别的第三世界文学体裁遭到冷落一样,她们偏爱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学。西方殖民者想借助东方女性不幸的个案,以点概全的诠释东方的女性主义及其发展,并借以推动西方女

性主义运动的开展。不过,东西方的女性主义都注意到了性别政治二元对立中女性所处的弱势地位,可她们同时也认识到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女性作品时往往比男性译者更能敏锐的体会女作者的内心感受,洞察到字里行间细微的笔触变化,这是大多数男译者望尘莫及的。在这种强弱势文化的交汇中,她们的翻译可以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实行统治的工具,也可以是弱势文化对抗强势文化的武器,语言成了她们对社会政治评论的竞技场。女性主义者以她们犀利的视角去观察,用她们独特的文风去言说,文化的争斗使她们对翻译更加垂青。

性别与翻译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然的本质联系,可当性别身份被带入到文本中,一切就会发生改变。1654年法国翻译家梅纳日(Gilles Menage)的双关语“les belles infidelles”(不忠的美人)一出,就令译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以下笔者以“不忠的美人”为喻,分析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以及它自身的局限性。

(一) 颠覆原文与译文的主仆关系

“不忠的美人”中的“belles”(美丽的)和“infidelles”(不忠的)在法语中用的是阴性,所指为女人,这就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把翻译等同于女性的隐喻。英国翻译家John Florio(约翰·弗洛里欧)总结,所有的翻译,因为必然有缺陷,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女性^{1}。从1603年开始,女性和译者的身份同时被置于低下的地位且历久不衰。甚至赫赫有名的《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的作者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都把原作与译本、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性别化了。女性翻译家阿伍德(Susanne de Lotbinière-Harwood)曾说:“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翻译”^{1}。这无疑显示出了女性主义翻译家的无奈,译者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化(marginalization)。

传统翻译观认为原文和译文是“主仆关系”,前者创作在先,后者只能被动传递;前者的权威不容侵犯,后者必忠于前者;处主宰地位的前者是雄健的男性,处从属地位的后者是残缺的女性。翻译的价值低于创作,“媒婆”和“处子”的比喻在译界流传甚广。余光中先生对译者所处尴尬的社会地位曾有论述:“译者笼罩在原作者的阴影之中,译好了,光荣归于原作,译坏了,罪在译者。除了有能力也有时间去参照原文逐一研读的少数专家之外,一般读者是无由欣赏的。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翻译的妙旨,就在这里: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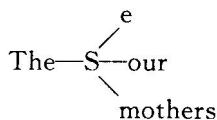
句话虽然是神谕,要传给凡人时,多多少少,毕竟还要用人的方式委婉点出,否则那神谕仍留在云里雾里,高不可攀。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3](55)}

译者对原文的神圣权威不可侵犯,只能顶礼膜拜。女性主义翻译观与此大相径庭,戈达尔德(Godard)认为,“在女权主义语篇中,翻译是生产,而非再生产。”^{[4](44)} 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翻译观把翻译看成是静止的活动从而限制了译者的主体性,原著中心论令翻译创作像银瓶中的花朵失去生命力。译者是原著和读者之间的纽带,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是原著译入语的首位读者并兼顾着阐释者和作者的身份。翻译以一种时空错位的交往形式存在,原著作者和译者之间只能以语言作为唯一媒介并且不发生共时性的交流。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其语言能力、审美水平、艺术创造力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翻译是文化间的介入和调和,译文是原文的话语重构,是译者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给予了原作异域的生存空间。因此,女性主义认为原文与译文的是共生共荣的关系。

(二) 颠覆忠实伦理

法国散文诗的开山鼻祖内尔特朗(Aloysius Bertrand)也曾把翻译比作女人,美丽的不忠实,忠实的不美丽^{[1](10-11)}。传统的翻译观以忠实作为衡量译作的唯一尺度,译作要求与原作达到别无二致的“化境”,而“不忠的美人”指的是只雅而不信的翻译。诚然,传统的翻译观已无法解释严复、林纾等已被公认的“不忠”的译作,“忠”与“不忠”显然已经不能成为评价的唯一标准。

原作与译作之间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对等,翻译的艺术也就在于它是一门接近的艺术。葛校琴教授在《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一文中曾举出路易丝·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例举的标题翻译。弗洛图以戈达尔德(Godard 1983)翻译尼古拉·布罗萨尔(Nicole Brossard)小说《L' Amèr》为例。法语词根据它的语法性别有阴阳性之分,L'是法语阴性代词la(the)。“Amèr”中包含至少有三个词:mer(sea海),mère(mother 母亲),amer(bitter 辛酸的)。这一标题看似不可译,译者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译文更是妙不可言。译者将原文的文字游戏变成书法游戏,左边是The,右边是e,our和mothers的竖排,左右两边用大写S(sea)作连接,组合后为“These Our Mothers”(这些我们的母亲)“These Sour Smothers”(这些辛酸的溺爱者)。



弗洛图总结了女性翻译家常用的三种翻译策略:增补(supplementing)、前言或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以及“劫持”(hijacking)来翻译作品。《L' Amèr》的翻译是女性主义译者利用增补策略使译文达到近乎忠实原文的典范,可女性主义也有重新定义忠实的呼声。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求译文对原作的忠诚就如同要求女性对丈夫或父权的绝对忠诚一样不公平。在《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一书中就有这样的案例,法国女同性恋作家高斯对法语进行个性化的处理,将常规中不阴性的词语阴性化。如她的句子:“Nulle ne l'ignore, tout est langage”(没有(女)人不知道,一切都是语言)。对“Nul n'est censé ignorer la loi”(任何人都不能推托不知道国法)或“Ignorance of the law is no excuse”)或“Une muette parle à un sourd”(女哑巴对聋子说话)^{[2](123-124)}阿伍德提出了“重新性化语言”(resex language)的策略,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语法来彰显性别特征,把“e”用粗体来突出性别身份:“No one ignores the fact that everything is language”和“A mute one speaks to a deaf one”^{[2](123-134)}。此外,霍吉路德(Joann Haugerud)等人对《圣经》中大量使用的“Man”或者“He”改成性别较中性化的词。

女性主义译者选取女作家的读本作为译本,通过翻译研究中的性别化视角发出“让女性的声音在译文中能被听到,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文中能被看到”的呐喊。女性主义给出了“忠实”的定义:“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1](2)}。女性主义提出了在女性主义的名义下重写,“重写”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原作者的初衷,融合自己的观点,对原作重构,并使之朝着女性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就无异于作者主观追求对原作的变形。“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维护她那根本的差异,她那无穷尽的再阅读和改写的快乐,把自己对操纵的文本标记昭示天下。翻译中女人驾驭(Woman handling)文本意味着她要取代那个谦虚而自惭形秽的译者。”^{[5](91)}“写作方案”的提出成了女性主义翻译作品的指路明灯,译作顺理成章的超越并取代了文本第一的地位。“重写”显然颠覆了传统译论中的“忠实”伦理,叛逆不能失度,不然就不使人不

由得使人质疑理论的合法性。

《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4][5]}),历史文化决定了女性地位,女性为了能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立足,自然地去迎合男性语言,从而使女性语言中既有女性语言又有男性语言。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的解放才是妇女的解放,近而女性主义开始关注语言,关注翻译。女性主义翻译观淡化了传统翻译观的抽象概念,否定单纯的语言翻译,并把翻译活动放置在文化转向的大语境下去考察,在承认个人兴趣的同时也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女性主义译者提出要“womanhandle”文本,用女性主义的方式重写。译者在重写过程中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大小尺度把握得如何直接决定读者的数量,若太过偏颇的强调女性主义的

观点,把自身禁锢在二元对立的桎梏中,恐怕就难逃孤芳自赏的命运。

参考文献:

- [1]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2] Susanne de Lotbinière - Harwood, The Body Bilingual[M]. Toronto: Women's Press, 1991.
- [3] 余光中. 余光中谈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 [4] Flotow, Luise von. Translation and Gender[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 [5] Godard, B. "Theorizing Feminist Theory/ Translation"[A] S. Bassnett and A.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90.

“les belles infidelles”

On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YANG Yang, TU Guoyua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der on translation studies, feminist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from language to translation and formed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ies. Through probing into the French saying of “les belles infidelle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s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the metaphor of female and transl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text and the faithful ethics of translation. Meanwhile, the limitations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will be discussed.

Key words: feminism; translation theories; contributions; limitations; identity

[编辑: 颜关明]